

短篇历史小说选

吴秀明选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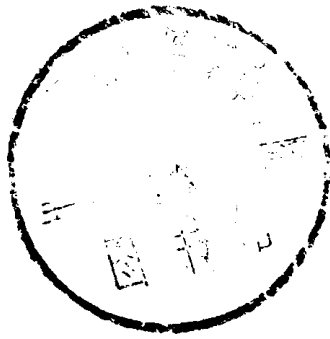


湖南人民出版社



短篇历史小说选

吴秀明选编



湖南人民出版社



短篇历史小说选

吴秀明选编

责任编辑：张永如

*

湖南人民出版社出版

（长沙市展览馆路14号）

湖南省新华书店发行 湖南省常德滨湖印刷厂印刷

*

1983年4月第1版第1次印刷

字数：440,000 印张：21.375 印数：1—43,000

统一书号：10109·1543 定价：1.60元

|||||

内容简介

建国以来的《短篇历史小说选》共选入了三十七篇作品；涉及的内容，从上古时代的大禹治水到近代的戊戌变法和义和团运动，从大陆到台湾，从宫廷到边塞……视野广阔，丰富多彩；塑造了大禹、西门豹、勾践、秦始皇、刘邦、萧何、曹参、韩信、诸葛亮、曹操、李世民、宋璟、赵构、朱元璋、海瑞、康熙、鲁亮侪、谭嗣同、慈禧等政治人物，以及司马迁、陶渊明、嵇康、怀素、吴道子、李白、杜甫、韩愈、李贺、辛弃疾、洪升、龚自珍等文人士子的栩栩如生的形象；在表现手法上，既有对我国传统小说的继承和发扬，又有对外国优秀作品的借鉴和吸收，风格多样，富于变化。它不仅给人以文学的美好享受，给人以历史知识，而且能给人以启示，活跃思想。

《前言》论述了我国历史小说的发生和发展、建国以来历史小说创作的坎坷经历、以及当前历史小说创作的成败得失。这对文学研究者和文学爱好者来说，都是很有助益的。

目 录

前 言	吴秀明 (1)
治 水	左 泥 (18)
西门豹的遭遇	师 陀 (28)
祭怒蛙	杨书案 (54)
荧惑星	叶至诚 (65)
通粤使	何维鼎 (83)
秦宫月	刘亚洲 (93)
萧何与曹参	吴双林 (123)
冤斩韩信	苏毅谨 (133)
强项令	王吉星 (151)
诸葛亮招亲	蒋星煜 (167)
鸡 肋	徐懋庸 (182)
广陵散	陈翔鹤 (205)
陶渊明写《挽歌》	陈翔鹤 (232)
李世民与魏征	蒋星煜 (248)
长安五月天	石 丛 (263)

宋璟毁碑·····	黄茂初 (283)
南陵秋晓·····	马 昭 (298)
杜子美还家·····	黄秋耘 (326)
白发生黑丝·····	冯 至 (334)
地狱变相图·····	刘正成 (347)
佛骨疏·····	余启新 (370)
李贺的梦·····	师 陀 (391)
雨落京师·····	阮振铭 薄忠信 (413)
李马渡康王·····	彭 拜 (429)
朱洪武执法·····	沈 湜 (473)
最后的恩赐·····	张 弦 (486)
海瑞之死·····	李束丝 (497)
人头祭·····	怀 英 (513)
杨娥恨·····	何光中 (528)
陈圆圆·····	何光中 (538)
乌兰布通之战·····	关语卿 (547)
金缕曲·····	戴明贤 (569)
鲁亮侪摘印·····	黄秋耘 (590)
热泪洒青词·····	晏国珖 (598)
秋去冬来·····	王 沛 王 江 (606)
大刀王五·····	王 和 (629)
太后的梦·····	郭纪金 (653)

前 言

吴秀明

—

历史小说的兴盛，据说是一个世界性的现象。如法国文坛近一时期出现了历史小说热，爱写、爱看历史小说者，蔚然成风，象《昂热利克》一书，在法国有几百万读者，在全世界有一百五十五种译文。又如日本，历史小说的大量产生、逐渐繁荣，已是当代小说创作中的一种新潮流。我们新时期的文坛也出现了某些类似的情形。从《李自成》风靡社会的一九七七年年底始，历史小说便一改旧观，迅速发展，名篇佳作，联袂而至，无论数量或质量上都取得了较著的成就。

当然，这并不是说，我们到今天才有历史小说。不！应当说，在我国，历史小说是古已有之，有着悠久的传统的。有的同志认为，我国先秦两汉时的史著《左传》、《战国策》和《史记》等，就带有历史小说雏形的性质。这也许不无道理。按照一般常识讲，小说与历史著作是不同的，历史书所写的人物和事件，都必须以史实为根据，而不允许作艺术夸张和艺术虚构，这就是所谓的“实录”。但是从《左传》、《战

国策》特别是《史记》来看，它们往往在“实录”的基础上，从纷繁的历史现象中选择典型的历史事件，以写人物为中心反映历史情况，又有比较完整的情节结构，鲜明突出的人物形象和强烈的艺术感染力。从这个意义上说，把它们称为历史小说的雏形，我想也是言之有理的。现在学术界论证产生于汉晋之间的散韵夹用的《吴越春秋》为历史小说。照此算来，历史小说经历了一千五百年以上的漫长道路。

但是，我们无须把历史追溯得那么久远。在中国文学史上，真正堪称历史小说并以辉煌成就影响了后世的，是宋以后的事了。鲁迅在《中国小说史略》中指出：“宋人说话之影响于后来者，最大莫如讲史”。“讲史”者，顾名思义，是讲述历史的，实质上亦即是历史小说。较早的影响较大的讲史话本是《五代史平话》、《大宋宣和遗事》、《全相三国志平话》。元明间人罗贯中根据陈寿《三国志》及裴松之注，“间亦仍采平话，又加推演而作”《三国演义》，并著有其他多种历史演义小说；施耐庵缀集民间关于梁山英雄的故事，“荟萃取舍之”而成《水浒传》，取得了重大成就，遂使我国历史小说逐渐繁荣，至明代嘉靖、万历年间而出现历史小说的创作高潮。吴门可观道人在《新列国志序》中概要地叙述了当时的情况：

“自罗贯中《三国演义》一书，以国史演为通俗演义百余回，为世所尚，嗣是效颦日众，因而有《夏书》、《商书》、《列国》、《残唐》、《南北宋》诸刻，其浩瀚与正史分签并架……”。这种变历史为通俗演义的形式，对传播历史知识曾起了相当的作用。袁宏道《东西汉通俗演义序》说：“今天下自衣冠以至村哥里妇，自七十老翁以至三尺童子，读及刘季起丰沛、项

羽不渡乌江，王莽篡位、光武中兴等事，无不能悉数颠末，详其姓氏里居，自朝至暮，自昏彻旦，几忘食忘寝。”这些话虽然有夸张的成分，但也可见当时历史小说流传之广，影响之大。不过，总的说来，它们的成就均不及《三国演义》。从艺术上看，它们过分依傍正史，甚至堆垛史料，描写粗糙，手法单调，许多历史小说不过是正史材料的联缀和通俗化，同时还普遍存在着浓厚的封建意识和唯心史观，封建糟粕颇多，审美价值也不高。这种状况，一直沿袭到近代。

随着无产阶级新文学运动的狂飚突起，历史小说才除旧布新，从思想到艺术都发生了根本的变化。“鲁迅先生是这一方面的伟大的开拓者和成功者”（茅盾语）。他不但先后写就了《补天》——原先题作《不周山》、《奔月》、《铸剑》、《理水》等八篇具有强烈战斗意义和针砭、讽刺现实的故事新编，而且还把日本著名现代小说家菊池宽的《三浦右卫门的最后》、芥川龙之介的《鼻子》、《罗生门》，以及苏联作家伦支等人的历史小说翻译过来，介绍给我国读者。二、三十年代，在旧中国的进步的文化界中，历史小说日趋兴起。郭沫若、茅盾、郁达夫、巴金、郑振铎、宋云彬、严敦易、施蛰存、聂绀弩等前辈作家都为此付出了辛勤的劳动，为我们留下了不少脍炙人口的短篇佳作。他们不仅努力用新的思想来观察和解释历史，而且在艺术上一反过去基本上是千篇一律的形式而显得丰富多样，各有千秋，从而为历史小说注进新的生命，使当时“沉闷的中国创作界里，输入一点新鲜的空气来”（郁达夫《历史小说论》）。

建国三十多年的历史小说创作，从总体上看，确实又比

二、三十年代有了很大的进展。这不仅表现在中长篇历史小说从无到有，异峰突起，成就惊人；就是数量和质量都略显逊色的短篇历史小说，比之过去又何尝没有显著的发展呢？

然而这些成绩的取得，历经了多少艰难曲折、逆转颠沛呵！综观建国以来短篇历史小说的创作，可以发现它与时代风云的变幻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同整个文学事业的兴衰起落大体是一致的。回顾一下它的创作进程，虽然是那样的坎坷迟缓，但毕竟也有两次较为活跃兴盛的时期。第一次是六一年年底至六二年年底，在一年左右的时间内，集中发表了四五十篇历史短篇。那时候，正值党的文艺政策的调整和对“左”的错误的初步批判之时。《文艺报》在《题材问题》专论中鲜明地提出：“文艺创作的题材，有进一步扩大之必要；题材问题上的清规戒律，有彻底破除之必要”，这就极大地调动了文艺工作者的创作积极性，许多在这方面有才华的作家，如姚雪垠、师陀、蒋星煜、黄秋耘等，都充分发挥自己的特长，写起了历史小说；就连长期从事诗歌创作和古典文学研究的冯至、陈翔鹤等老作家、学者也受到鼓舞，欣然命笔。这样，历史短篇便爆发式地破土而出，造成了一时的盛况。可是好景不长，一九六三年年初，张春桥之流突然提出要文艺“大写十三年”，而且还宣称文艺的题材决定文艺的性质，只有反映十三年社会主义生活的才能算作社会主义文艺。这样一来，历史题材便成了创作的禁区。此后，历史题材便基本上绝迹了，成了“不准出生的人”。从六四年起，代而兴之的是批判声讨的文章充斥报刊，而且愈演愈烈……。

粉碎“四人帮”以来特别是三中全会以来，随着思想解

放运动的蓬勃兴起和党的文艺方针的深入贯彻，短篇历史小说又出现第二次活跃兴盛的局面。从十月胜利到党的三中全会的召开，历史短篇先是经历了一个徘徊时期，创作沉疴未起，几乎是一片空白。但到七九年年初，很快就冒出了一些新作，从此出现了勃兴之势，不仅数量上创造了历史的最高纪录，共写就了一百余个历史短篇，而且充分发挥自己的优势和特点，于题材、主题、人物、形式和手法等方面，都有不少新的突破。这种现象的出现，在这里没有时间赘述，但需要指出的是，它跟文学期刊的空前繁荣有着密切相关的缘由。众多的刊物为历史短篇的创作提供了广阔的园地，创造了极有利的条件。于是乎，有着古老传统的短篇历史小说便顺理成章地谱就了旷古未有的瑰丽篇章。

二

综观建国以来历史短篇的创作，内容丰富，题材多样，林林总总，颇为可观。一百五十多个短篇，充其量不过是许多个似断似连的小镜头而已，但它们毕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上下几千年、纵横几万里华夏古国社会生活的样相。文学的视野，比起“五四”以后三十年的历史短篇来，是大为广阔了。这完全符合广大人民群众日益强烈的多方面的艺术欣赏的要求。

要用最简明的话来概括建国以来历史短篇的题材是有困难的。因为它涉及的生活内容是颇为广阔丰富的，从上古时代的大禹治水到近代的戊戌变法、义和团运动，从大陆到台湾，从宫廷到边塞，各个历史“断层”有影响的许多事情和

人物，几乎都被我们的作者摄进作品里。其中有的揭露专制独断、绝对君权给国家和人民带来的严重灾难；有反映如何冲破重重阻力，使冤假错案被昭雪；有的控诉封建主义思想对科学民主的扼杀和禁锢；有的再现改革与保守的斗争；有的批判封建愚忠思想和盲目崇拜；有的描写封建迷信和宗教狂热；有的抨击昏庸君主、奸佞朋党罪恶行径；有的赞颂清正廉洁君臣的高风亮节；有的表现落第秀才铤而走险，广招会众；有的讴歌民族英雄驰骋沙场，保家卫国；有文人学士的怀才不遇，失意痛楚的；有江湖侠客的见义勇为，打抱不平的……在那众多的题材中，却有一个共同的特点，那就是致力于对历史生活的真实性和多样性的描写，跟人民一道庄严地思考许多重大的历史课题，既歌颂真、善、美，又鞭挞假、恶、丑，以古鉴今，警策现实，从而使作品普遍具有鲜明的时代精神。其中最集中、最突出，也是写得最成功的，则是反映封建文人学士升沉遭际和劝谏、执法、举贤斗争两大类。

在反映封建文人学士生活方面，陈翔鹤的《陶渊明写〈挽歌〉》是值得称道的一篇。小说截取了陶渊明写“挽歌”前后两、三天的一小段生活，以富于想象的艺术彩笔，质朴纯真的语调，绘声绘形地展示了处在晋宋易代时期大文学家陶渊明的思想、风格和他的生死观。在一九六一年底，整个历史小说处在冷落的时期，这一佳作的出现，犹如空谷足音，震动了文坛，引起了广泛的社会影响，从而为历史短篇的发展赢得了声誉，闯开了一条新路。继《陶渊明写〈挽歌〉》后，一批侧重表现知识分子坎坷经历和不幸遭际的作品便接

连出现；而一九六二年，恰值杜甫诞生一千二百五十周年，于是在这类作品中，杜甫便成为许多作家的“热门”对象。写得较好的是冯至的《白发生黑丝》和黄秋耘的《杜子美还家》。它们写得同中有异，各有妙处。一年以后，陈翔鹤又写了《广陵散》。作者在“附记”中说，“是想通过嵇康、吕安的无辜被杀，来反映一下在魏、晋易代之际，由于封建统治阶级争夺王位和政权，一些具有反抗性、正义感的艺术家们，曾经遇见过怎样的一种惨痛不幸的遭遇。”这对帮助今天的读者去认清封建统治阶级残忍的本性，是大有裨益的。陈翔鹤谙熟这一段历史生活，对描写的题材有着经过深思熟虑后得出的真知灼见。他着重写人物，写性格，写命运，但也注意故事情节的组织，并且笔带感情，娓娓动听。读他的两篇小说，我们感到他对陶渊明、嵇康、吕安思想性格的内涵上有着独到深入的探索。

可喜的是，在描写文人学士生活方面作出可贵成绩，到了新时期以后，不只是少数的几篇，而是有相当多的一批。如师陀的《李贺的梦》、马昭的《南陵秋晓》、刘正成的《地狱变相图》、晏国玢的《热泪洒青词》等，数量足有上五十篇之多，占全部作品的一半以上。它们或是通过李白、李贺、龚自珍等善良耿直、富有才华的知识分子在无边黑暗中辗转呻吟和无辜遭厄的描写，向专制腐朽、摧残人材的封建社会提出了强烈的控诉；或是赞扬他们潜心学业，磨砺技艺，发愤图进，精益求精；或是批判他们虚伪的高傲，庸俗的尊严，甚至嫉贤妒能，撵铲后秀。这些作品，主题有深浅，描写有精粗，手法有高低，但都比较好地发挥了短篇小说的以小见

大的艺术功能，具有一定的思想深度和艺术感染力。它们没有停留在生活的表面上，以渲染冤案造成的苦难及由此而来的凄楚离愁为满足，多数还写了文人学士的美德，甚至在无辜受屈的情况下仍然刚强不阿地为理想而奋进、为人民和自由而歌唱的精神情操，因而激发了读者对邪恶势力的憎恨，对破灭的美的同情和追求，受到了启迪和教育。

另一类是表现劝谏、执法、举贤斗争的作品。这类作品就时间而论，要比描写文人学士的早出两年多，但在数量上却不如前者多；不过，就社会影响而论，它又要超过前者。这是因为它们顺应着时代潮流，提出了许多深刻尖锐的社会历史问题，不时地为现实提供可资借鉴的经验教训。如蒋星煜的《李世民与魏征》、石丛的《长安五月天》通过魏征对唐太宗忠谏的具体描绘，显示了一个严肃的主题，统治者只有纳言从谏，广开言路，才能保持清醒的头脑，达到政治上的清明；黄秋耘的《鲁亮侪摘印》、李束丝的《海瑞之死》、沈湜的《朱洪武执法》、王吉星的《强项令》、刘亚洲的《秦宫月》等作品从执法角度鞭打了封建恶势力，对那些严于执法，不徇私情的英明君主和清正官吏，如鲁亮侪、海瑞、朱洪武、董宣、秦始皇等则作了热情的赞扬；余启新的《佛骨疏》围绕韩愈劝谏唐宪宗迎佛骨这一事件，生动如画地折射出当时社会鬼魅横行的氛围，控诉了封建迷信的罪恶和对人民精神的严重戕害；黄茂初的《宋璟毁碑》正面描写“布德泽于南越”的宋璟亲手砸毁当地人为他立的“遗爱碑”，告诉人们功德不是靠碑所能立得起来的，当政者要做到扶持正气，戡灭邪气，首先要以身作则；叶至诚的《荧惑星》则从反面的惨

痛教训中，说明量才录用、合理使用人材的重要性。诚然，这些明主清官的所作所为从根本上说是为求得本阶级统治的长治久安，但我们所以赞扬肯定他们，那是因为他们这些政施和行为是具体历史条件下在某种程度上对人民有益，而且至今仍然对我们有着警策借鉴作用：封建时代的君臣尚且能够做到豁达大度，从谏如流，不畏权势，执法如山，爱惜人才，敢讲真话，我们无产阶级难道不应该做得更好吗？毛主席在五八年、六二年时多次提倡要学习魏征精神和海瑞精神，分明就是这样的含意。上述这些作品，以具体生动的艺术描绘，形象地显示了这一点。它们对阿谀奉迎、循私枉法，摧残人材的贪官污吏的抨击，对进忠言、严执法、举贤人的清官净臣的赞扬，很能引起人们的共鸣和联想。人们对党风民气的改变，法制的健全，才路的开辟等期望要求，往往能从中找到一些历史答案。因而这些作品发表后广受欢迎，产生了不胫而走的社会效果。“有人认为，历史题材教育意义小，现代题材教育意义大。我看不见得，要看剧本如何。”周总理所论，完全适合建国以来历史小说的创作实践。

此外，还有象写曹操功成名遂后悲哀的《鸡肋》（徐懋庸），写韩信、肃顺冤案的《冤斩韩信》（苏毅谨）、《秋去冬来》（王沛等），写康王赵构忘恩负义、以怨报德的《李马渡康王》（彭拜），写勾践体察民情、心怀鼙鼓的《祭怒蛙》（杨书案），写康熙皇帝亲征乌兰布通、击败沙俄策划叛乱的《乌兰布通之战》（关语卿），写名妓颜衰失宠的《陈圆圆》（何光中），写侠士义烈豪举的《大刀王五》（王和），写台湾高山族人纠纷的《人头祭》（怀英）等，都颇有积极意义，很值得一读。从以

上远非完备的简述中不难看出，历史短篇题材的丰富性、多样性和主题的深刻性，是过去任何时候所不能比拟的。

但是，我们也应当看到，无论在反映历史生活的广度和深度方面，比之历史本身的丰富多采，历史短篇还存在着很大的距离。本来，中国的历史特别悠久，史籍也最丰富。世界上几个文明古国如埃及、印度，都没有象中国这样保存了将近三千年的完整的编年史和历史人物传记，其中可以用来创作的人物和事情是很多的，所谓“唐三千、宋八百、三国列国无其数”，创作题材可谓取之不尽，用之不竭。面对这样波涛浩荡的历史长河和丰富博大的史籍，现有的短篇只反映出几点浪花，发掘了极有限的部分。无数题材都还没有为短篇所涉及。而思想艺术上都比较成功、深受人们欢迎的作品更是寥若晨星。因而，提高历史短篇的水平，大大扩展其题材，深化其主题，仍然是当前及今后创作中亟待解决的课题。

三

人物形象的塑造是文学创作的中心问题。这是因为不通过人的描写，便无以反映社会，无以展现历史的图画，也无以紧紧抓住读者的心并从感情上去打动读者。这就是为什么有识见的作家无不把心血倾注在形象的塑造上，调动一切艺术手段，刻意求工地写现实社会中人的关系、人的命运、行为、思想、感情和性格。在这方面，建国以来的短篇历史小说是作出了可贵的努力的。

历史短篇塑造人物的主要手段是在情节发展和矛盾冲突

中来表现人物的精神面貌和性格特点的。黑格尔说过，“人格的伟大和刚强只有借矛盾对立的伟大和刚强才能衡量出来”，“环境的互相冲突愈多，愈艰巨，矛盾的破坏力愈大而心灵仍能坚持自己的性格，也就愈显出主体性格的深厚坚强。只有在这种发展中，理念和理想的威力才能保持住它自己，才足以见出威力”（黑格尔《美学》第一卷第222页）。这段精辟宏论也适合历史短篇的创作。试看那些有血有肉、栩栩如生的人物，大多都是置身于极为艰难困厄的环境里，放在错综复杂的矛盾对立面中，其思想性格有着充分广阔的显露余地。在这点上，我以为《佛骨疏》是写得较有特色的。韩愈上疏，牵一发而动全身，引起了多大的波澜：皇上震怒，政敌诬陷，寺院恐吓，家庭反对，至交劝限，甚至连惻隐和尚也半路跳出来砍他一刀。明知“一言出口，必犯天威”，但“为大唐国运，为皇上江山，为百姓生计”，韩愈毅然力排众议，不顾个人生死安危，冒死挥笔进谏，并且在疏文尾处豪迈地表示：“如果佛果真有灵，就降罪于他一人，决不怨悔。”正是通过纷繁万端的社会关系和紧张尖锐矛盾冲突的描写，才使一个古板倔强、傲骨铮然，“欲为圣明除弊事，肯将衰朽惜残年”的韩愈老人跃然纸上，活脱脱地立在读者的面前。用这种艺术手段塑造出来的人物，大多鲜明生动，传神逼真，棱角清晰，线条比较粗犷，有的犹如刀砍斧削出来一般。

还有一些作品塑造人物也写矛盾冲突，但更侧重于人物内心世界的解剖，感情波澜的揭示，笔力绵密细腻，丝丝入扣，形象内涵写得深邃丰满，富有立体感。例如马昭的《南陵秋晓》，它把李白父子分别时内心深处矛盾复杂心情作了极